

# 历史创伤的重复与修通

章朋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241)

**摘要:** 在“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中, 双方忽略了历史研究的移情作用, 未能认识到纳粹屠犹的深层动因。拉卡普拉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对欧洲宗教世俗化现象进行了分析, 认为纳粹屠犹是一种被压抑了的历史创伤的复归, 替罪羊和牺牲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书写创伤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行动化复现, 有助于在历史学家与研究对象的移情作用中使历史的压抑物得到释放, 使创伤主体获得一种伦理政治主体的能力。拉卡普拉提出批评理论的“伦理转向”, 强调历史书写与创伤修通中哀悼的社会伦理维度, 它们与社会伦理、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 只有在取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团体支持的语境中, 才能确保修通的有效性。

**关键词:** 书写创伤; 移情; 创伤重复; 修通; 伦理转向

**中图分类号:** K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5-0151-08

在历史学研究方法危机重重的后现代语境中, 思想史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是博采众长以解历史学困境的重要理论家之一, 他将文学批评、哲学、精神分析等理论话语悉数纳入囊中, 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交叉学科性质, 其中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平行对接和互动, 以及由此寻求对历史创伤的修复, 成为创伤理论发展的重要一环。尽管精神分析与历史研究的渊源甚早, 但拉卡普拉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心理学的历史学, 抑或精神分析只是历史学领域的一个支流, 其运用局限于将精神分析学中的概念直接挪用至历史学研究中。这一处理路径压制了精神分析与历史学更为深层的互动, 尤其是没有发挥精神分析治疗在历史创伤修通方面的作用。

拉卡普拉指出, 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学中的概念优先用于个体发生学(个体), 再以一种类比的方法用于种系发生学(社会)是一种误导; 个体或特定历史过程不能被视为总体性的派生物, 而是处于社会之中且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过程相关联, 移情、创伤、行动化复现(acting-out)、重复、压抑、修通(working-through)等概念则打破了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基本对立, 对个体和集体同样适用, 且根据不同情境可运用于历史创伤的修复。拉卡普拉将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的互动置于广阔复杂的社会语境中, 以期促进历史学科自身的反思或历史研究方法的自我批评, 亦使历史书写和历史创伤的修复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伦理政治

问题。

## 一、“德国历史学家之争”： 历史书写中的移情

问题的缘起是如何书写第三帝国的历史。1968年, 德国社会爆发了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 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面对纳粹问题, 以及如何面对资本主义体制中纳粹复活的危机意识<sup>①</sup>。沉浸在清算历史的狂热之中的联邦德国, 未能实质性地解决相关问题, 为历史的重复埋下了种子。这颗种子在1986年引起了“德国历史学家之争”<sup>②</sup>, 1996年爆发“戈德哈根之争”。对历史态度的反反复复<sup>③</sup>, 表明联邦德国一直无法走出二战阴影, 历史噩梦的每一次重复都不过是对现实的某种回避或短暂宣泄。从历史的创伤中走出来, 建立积极的身份认同, 是历史学家们的共同诉求。

“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影响颇为深远, 其焦点是纳粹历史的独特性问题, 以及能否被“正常化”处理。以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为首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与哈贝马斯等反对派就此进行了论争, 毫无结果, 却引出了不少问题。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总结道:

独特性……并不应该成为问题所在, 无论其他政权是否有过大规模屠杀, 杀戮本身都是可怕的。比较

也并不是为了开脱罪责。然而,实际上独特性又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了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奥斯维辛是公认的恐怖事件,但又只是诸多大屠杀的一个样本——如所谓的修正主义者暗示的,那么德国仍有望成为一个被国民重新接纳的国家,就像曾经发生过类似屠杀事件的苏联。但如果最终解决方案是不可比较的——如反对派的历史学家们所坚持的,那么历史就永远无法修通(worked through),未来永远无法正常化,德国民族将污点永存,像体内无法排除的毒素。”<sup>[1](41)</sup>

梅尔提出了一个古老的二元对立命题,这些对立贯穿于整个论争过程,包括独特性和可比性的对立、客观与主观的对立(历史的书写是否能够以第三视角达到所谓的客观性)、历史与记忆的对立(历史学研究是否仅能局限在专业领域内),等等。诺尔特等人将纳粹行为与苏联集中营进行的比较作为一种否认机制消除了纳粹罪行的独特性,混淆了“常态”与“正常化水准”的区分;而反对派抵制纳粹罪行的“正常化”,呼吁客观地书写历史。一边是对历史创伤的强行压制和否认,一边是毫无意义的重复,论争双方各执一端<sup>④</sup>。

拉卡普拉在此引入了精神分析学概念,即认为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存在一种移情作用(transference)。他认为:弗洛伊德将移情作用限制在临床医学上分析师与患者一对一的个体关系中,其意义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对这一概念的重新阐释和再利用,有助于消除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中产生的各种二元对立。他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等同于精神分析师的治疗工作,把历史当作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声音的对话者,而不是文献堆积的客观对象,它某些时候甚至会抵制阐释者的强制解释;历史书写实际是一个发生于移情作用中的“谈话治疗”过程,这种移情体现于历史学家必然在个人话语或实践中重复活跃在其研究对象中的一些特征,“历史”从而渗入了历史学家的个人叙述和分析的主观声音。

因此,精神分析学方法的介入动摇了客观主义的历史书写,它“并不认为客观性是一个仅仅给定的或想当然的专业立场,对这一立场的偏离总是可以得到纠正,并且回到第三人称视角的客观性上”<sup>[2](67)</sup>。哈贝马斯所谓的客观书写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或想象,且他作为一个影响广泛的传统哲学家、知识分子,其所捍卫的批判理性传统及启蒙思想家形象不允许他认可修正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态度。诺尔特等人的历史书写更明显地体现了移情作用,他将德国民族纳入了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受害者行列,认为苏联打开了屠杀的先例,由于害怕成为苏联的受害者,纳粹行为不过是对苏联暴力的畏惧性回应,是“古拉格”导致了

“奥斯维辛”。另一位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年轻时在东德战场及其被迫逃离家乡的经历,必然也使其对奋战在东线的德国士兵抱以同情,他认为德国才是受害者,对苏联的抵抗是一种正义的英雄壮举。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解释道:“对曾经的个人经历的认同长期遭受压抑,这种压抑难以预料的复现是无可避免的。”<sup>[3](45)</sup>可见无论诺尔特还是希尔格鲁伯都对纳粹德国产生了移情乃至顽固的身份认同。

拉卡普拉将移情作用与无条件的身份认同作了区分。移情并非意味着不加批判地认同研究对象,简单重复对象身上的特点。“德国历史学家之争”的双方都难以自控地对其研究对象发生了身份认同。而移情之不同是研究者将自己放在研究对象的位置上去感受或体验,并不取代研究对象,不消除或同化对象的差异或他异性(alterity);它促使自我认识到自身内部的他异性,或者认识另一个不同的自我,将他者作为自我的一个构成性要素来经历与对话。作为没有经历过历史事件或创伤的历史学家或后来者,必须通过移情的方式才能书写历史,并克服那些沉溺于过去而无法表达自身及麻木地表达过去的矛盾,只有在移情中拒绝与对象发生身份认同,才能充分发挥移情的积极作用。

拉卡普拉指出,在特定历史事件尤其是大屠杀这样极端的历史创伤事件中,移情作用随历史学家不同的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而变动,其对历史书写的视角或描述都大相径庭,不同历史学家独特的主体位置往往表现出对研究对象不同程度的同情(empathy)。此外,每个历史学家所用来书写历史的语言,也是独特的,且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移情作用的效力。比如马克思在其历史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使用的语言就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导向,其关于路易·波拿巴是“资产阶级的渣滓”“渣滓,废物,所有阶级的遗弃物”的斥责是咄咄逼人的。拉卡普拉评论道:“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以及其他阻挠革命的社会团体强烈的论辩式敌意,可能是为了隐藏或者压制某种恐惧,即担心无产阶级不是他所希望的革命主体,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不再信守革命的承诺。”<sup>[4](284)</sup>这种对语言的述行使用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产生移情的重要体现。

实际上,历史书写中的移情与伦理、政治要求和社会责任密切相关。如果仅仅是与受害者或者施暴者完全地认同,或无差别地重复研究对象,那么他们就将自己作为历史学家所要承担的在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的责任轻易地推卸了。书写历史需要考虑当下语境对历史研究活动的影响,所使用语言的性质,以及历史话语与移情、行动化复现、修通等过程的关系。

尤其是在移情过程中不与任何既定的主体位置认同，如施暴者、受害者、旁观者乃至后来出生的人们，等等，不能简单地复制这些主体的位置或经历，而要以同情并有距离的批判模式研究他们及其彼此之间复杂难解的各种形式；历史学家应“致力于探索一个不倾向于受害者，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具有实践意义的复杂的主体位置”<sup>[5](199)</sup>，在移情的对话中、对历史的一种带有批判性距离的情感回应(response)中，正确处理历史问题。

纳粹历史在联邦德国的反复回荡，使历史学家们陷于循环往复的论争之中，“移情作用”为我们理解过去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更好的路径。“从移情的角度来看大屠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使其具有可比性，但这个概念的价值所在是为了突出历史事件在何种程度上产生创伤的潜在可能性(traumatizing potential of events)的差异性，并将大屠杀定位为一种检验甚或是动摇既定范畴(categories)和可比性(comparisons)的极端情况。”<sup>[6](47-48)</sup>正是通过移情概念，研究对象成为可比的，但这种比较又不仅是为了寻找相似性而比较，而是为了突出差异和独特性而比较。拉卡普拉认为历史学家和过去的对话把弗洛伊德临床医学上的“谈话治疗”带到了社会政治实践的层面，其抵制历史创伤重复的前提，就是根据历史学家的主体位置，建立与历史对象相适宜的移情关系，通过历史书写让过去不断行动化复现，使历史成为有意识的回忆。拉卡普拉对历史书写中移情作用的突显避免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对立问题，并使二者通过移情得以弥合与对话，为其历史创伤的修通理论奠定了技术性基础。

## 二、纳粹意识形态：压抑物的复归

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弗洛伊德认为犹太民族对埃及人摩西的杀戮产生了一种创伤，它一度不被觉察且遭到遗忘和压制。但关于摩西和他的宗教记忆并没有彻底消失，在潜伏相当长的时间后，又重新浮现出来复活了摩西之前创立的宗教。弗洛伊德将这一历史现象称为“压抑物的复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sup>[7]</sup>。在此意义上，历史“确切地说它在发生时是无法被充分感知的，或者换个说法，历史是在距它发生之后的某个无法接近的时刻才能被抓住。”<sup>[8](187)</sup>这一无法接近的时刻实际上是一种延迟了的重复；弗洛伊德认为重复是人的本能表现。但它不应局限于个体或宗教领域，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仍可以说“重复是物质世界的运动方式”<sup>[9](10)</sup>。此外重复并非意味着停滞或连

续性的断裂；早期宗教与信仰实践因遭受否认、压制和拒绝而形成创伤，从表面上看使历史肌体的表皮出现了断裂；但所压抑的事物或意识在某个时间又会重新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再次具有连续性。历史的连续性中包含了大量断裂和重复；而变化也并非完全断裂——即便是在创伤的极端历史形式中。历史创伤及其复现不能诉诸简单的连续性或非连续性模式，这种重复中包蕴的历史进程，拉卡普拉称之为“重复的时间性(repetitive temporality)”，它是重复和变化的合体。历史创伤本身弥合了断裂和连续的双重状态，它是通过时间的延宕和重复产生的。

拉卡普拉由此将精神分析概念在宗教领域的类比分析提升到整个欧洲文明的高度，在历史的断裂中寻找隐匿的连续性。他用“压抑物的复归”的概念对西方文化思想史中的重要趋向即宗教世俗化现象进行了考察。世俗化现象涉及的是科学、理性或各种反宗教的新兴势力对早期宗教信仰及其实践的挑战，科学理性对宗教力量的胜利使宗教信仰成为边缘化的非理性话语乃至被压抑和否认的对象。“与早期意指实践相脱离是一次创伤”，但“被压抑的事物(经过长期潜伏)会以一种扭曲或伪装的形式呈现出复归的趋势”<sup>[6](171)</sup>。在宗教世俗化之后的历史语境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对早期宗教的置换，以及那些曾被压抑的宗教特点或成分的复归。纳粹意识形态就是其中一种带有救赎信息的世俗宗教，其替罪羊(scapegoating)和牺牲(victimization)机制是导致对“他者”进行屠杀的重要原因。

拉卡普拉认为纳粹的替罪羊和牺牲机制是被忽视的维度，不能对此有清醒认识，就无法真正理解历史。作为小集团的纳粹分子依赖于两种重要的关系，一种是官僚机器，一种是带有替罪羊机制和一个核心领导的完整社群或共同体。官僚机器是技术理性的产物，它使个体原子化，成为整体结构中的零部件，其职能是实现完整共同体的工具或手段，通常以技术理性的方式运作，对犹太人的屠杀不过是执行工作任务。更为高级的目标是一种完美的共同体生活。纳粹政权作为总体，无论在组织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完整的，而当前在这一民族团体内部却存在着各种外团体(out-groups)的威胁，犹太人、同性恋者、吉普赛人等，他们在文化上被贬斥为肮脏的、无根的、居无定所的，给整个共同体带来了厄运和污点，使纳粹作为共同体变得不完整和不纯洁。犹太人是导致一切罪恶的原因，成为投射了现代世界焦虑和病态的携带者。纳粹意识形态无法容忍自我内部混杂的他者，同时他者也引起了纳粹的恐怖性焦虑。这一焦虑交织着卫生学、仪式

的和色情的成分,类似于对易携带瘟疫病菌、损害健康的老鼠的恐惧和焦虑<sup>⑤</sup>。诺尔特所认为,纳粹将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投射到犹太人身上,恰好证明纳粹将犹太人当作了替罪羊。当然犹太人作为替罪羊而牺牲,并非纳粹主义者智识愚钝,拉卡普拉认为他们其实采取了一种“狗智理性(cynical reason)”的态度,齐泽克说“狗智主体(cynical subject)对意识形态面具(ideological mask)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心知肚明,但他死死抓住面具不放”<sup>[10](25)</sup>。彼得·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的公式于是被拉卡普拉改装为:“我知道犹太人,根据我们的意识形态,是不应该牺牲的受害者(害虫,坏蛋),但不管怎样,我要牺牲他们。”<sup>[2](40)</sup>为维护纳粹的完美总体性或追求“美”(beauty)的美学意识形态(aesthetic ideology),代表罪恶的根源力量或携带病菌的肮脏的犹太人必须被从共同体中清除出去,犹太人经世俗仪式或扭曲了的“献祭”成为替罪羊和牺牲品。

对内部他者的清理,试图恢复完美的总体性,实现自我救赎达到一种再生,是韦伯所说的宗教救赎不可或缺的一种信念特质<sup>[11](191)</sup>。在弗洛伊德的理论视域中,这种牺牲更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似乎“只有通过部分的死亡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无机体’,有机体才能保证其生存”<sup>[12](92)</sup>。由此,纳粹的屠犹行为和动机可以被解释为某种内在焦虑的投射<sup>⑥</sup>,对犹太人的替罪羊式屠杀则转变为献祭的崇高仪式。

屠杀犹太人被纳粹主义者转化为一种崇高的美学意识形态,这也是对宗教神圣性的一种世俗置换。纳粹对完美总体性的追求和通过犹太人的牺牲获取救赎,对于这种压制与升华<sup>⑦</sup>,拉卡普拉称为“否定的崇高”(negative sublime)。这一概念突出的是否定性方面,涉及的是在濒临死亡或极端危险的环境中所体验到的欣快和兴奋。在纳粹否定的崇高的美学意识形态中,其对集团内部他者的暴力屠杀,以及对日常伦理规范的僭越,对道德底线的彻底摧毁,在否定和僭越中获得的快感,正暗合了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的死亡本能。齐泽克说:“崇高客体以纯粹否定性的方式诱发快乐。”<sup>[10](259-260)</sup>纳粹行为已经突破了人类的一般智力范围,成为一种难以理解和想象的极端事件。其彻底否定的意识形态使现代主义的言说和再现方式陷入了困境,且对历史的重构或再现提出了挑战。这种彻底的否定和僭越也使传统的救赎叙事发生了危机,超验预设或目的论濒临破产。

传统的超验预设和目的论将特定事件纳入宏观历史进程中,以简单的总体性实践加以压制、忽略乃至否定。这些总体性模式是《圣经》历史救赎模式的翻

版,或《圣经》结构的置换,历史被叙述为一个从开始、发展到结尾的宏大故事,其中的挫折、倒退、停滞、矛盾都是暂时的,其意义即在对立面的消除或超越,对非理性和矛盾的融合,最终达到历史的终极目的——最高认同或总体性。在总体性话语实践中,“对意义和价值的全面救赎是话语的本质”<sup>[6](191)</sup>,至于其历史过程,往往通过转化成为最终目的的佐证或手段,突出其正面意义以衬托总体性的至高无上,而在实现最终目的后又遭到淡化、否定或抛弃。

拉卡普拉敏锐地指出历史创伤作为一种压抑物的复归,不断遭受总体性话语实践的霸权支配,其主要表现为两种趋向:一种是否定和压制创伤,比如在救赎或拜物教叙事中通过目的论故事排斥或边缘化创伤,以一种历史进步论的论调将历史过程中的事件编码成总体性结构中的原子式存在,历史成为被动的投射了个人主观价值或愿望的符号;另一种则将一切历史都建构为创伤,且只有通过总体性的想象的、虚幻的希望才能得到救赎,这一将创伤普遍化的趋向实际上是加剧了创伤,混淆了具体事件的历史性创伤和超历史的结构性创伤的区别。

大屠杀是欧洲技术理性发展之后的重要事件,也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界,它使传统的救赎叙事产生了危机。正如阿多诺认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传统叙事已经无法再现纳粹否定的崇高美学,其作为彻底的世俗化超越,是难以再现的。阿多诺说:“反犹主义是一种精致的图式,也是一种文明仪式;集体屠杀就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仪式。从中可以看出,将它们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意识和意义已经无能为力,真理也已走入穷途末路。”<sup>[13](156)</sup>大屠杀对日常伦理规范的极端僭越,突破了人类情感所能理解的界限,因此它所涉及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或过去的事件,而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和文化创伤,其挥之不去的阴影是被压抑的历史意识的复归或重复。由于传统的历史书写不断否认、拒绝或压制这一复归的意识,阻碍了历史创伤的宣泄和疏通;主张铭记过去的历史学家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修通历史创伤,最终对历史创伤的记忆仅仅成为无止尽的重复;拉卡普拉诉诸书写创伤的社会行为和伦理转向,为历史创伤的修通探索了新的可能。

### 三、历史创伤的修通:书写创伤与伦理转向

“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中的双方首先没有认清纳粹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美学意识形态及其所附属的替罪

羊和牺牲机制，使论争陷入了毫无结果的消极循环，大屠杀“独特性”的讨论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没有在历史的缺失(absence)和丧失(loss)之间做出区分，继而区分结构性创伤和历史性创伤。

拉卡普拉将缺失界定为一种根本性的绝对的缺失，它超越历史不涉及任何具体事件，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维度；缺失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终极基础，是一切社会和文化所共有的，因此就缺失这一概念而言，人们必须认识到它不可能再有所失。丧失则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包括特定对象的死亡和失去，它是经验的组成部分，丧失的对象是具体的确定的，它不仅可以避免、补偿也可以得到克服。缺失与丧失是两种并非对立但又必须加以区分的范畴，“当缺失与丧失合并，就会出现瘫软的忧郁感或狂躁不安，特定历史丧失的意义或效力(如种族隔离或大屠杀)被混淆或轻率地普遍化了。结果是这样令人怀疑的观点，即任何人(包括施暴者或合作者)都是受害者，一切历史都是创伤，或者所有人都共享了一种病理学上的公共领域或‘创伤文化’。”<sup>[5](64)</sup>而当缺失转换为丧失，就会产生一种留恋过去的怀旧病，或认为曾经存在一种完美无缺的虚幻总体性，后因他者的侵入或污染，使这个总体遭到了破坏、分裂或堕落，于是以期通过再生或救赎达到更高层次的重新统一。弗洛伊德的“阉割焦虑”是将缺失转换为丧失的典型案列。拉卡普拉认为弗洛伊德将女性阳物的“缺失”转变为一种原本存在尔后因获罪消失的“丧失”，实际上是对从未存在的总体性的一种想象，其结果是“随着想象总体性的出现，阉割叙事成为我们曾经说过的伟大故事的变体(也可能是启示录)——阶级启示录的叙事(以及对思辨辩证法的替代叙事)”<sup>[14](54-55)</sup>。与此同时，又由于缺失的焦虑没有特定的对象，也无法消除或克服，只能以各种方式承认这种缺失的存在并与其共存；强行将缺失对象具体化，并为达到所谓最初的总体性而将这个对象消除的行为，必然导致替罪羊或牺牲机制的出现。反之将丧失转换为缺失，具体的丧失对象变成了超历史结构的形而上存在，主体将陷入与失去对象的自恋式认同，执着于过去的无止尽忧郁从而将自己禁锢在绝望和孤立中无法自拔。

与缺失和丧失相对应的创伤结构，拉卡普拉将其区分为结构性创伤和历史性创伤。结构性创伤是普遍存在的、无法彻底消除的，历史性创伤则是具体历史事件造成的结果。在“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中，诺尔特合并了两种创伤，将极端历史事件普遍化，否认和压抑了历史创伤。哈贝马斯则专注于历史性创伤而忽略了结构性创伤，难免因固执于创伤事件，纠结于无

法过去的过去。对此拉卡普拉从弗洛伊德理论中借用了两种处理历史创伤的途径：行动化复现(acting-out)和修通(working-through)。

书写历史是行动化复现历史创伤的重要方式，拉卡普拉将历史当作谈话治疗的对象，以一种隐喻的方法将书写历史转变为书写创伤(writing trauma)。“书写创伤通常被视为一种表演(enacting)，有时也等同于以述行话语或艺术实践将历史创伤行动化复现(acting it out)出来。”<sup>[6](186)</sup>书写创伤本身是一种重复，它必须在历史学家的移情作用中变成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化复现，并加以控制，才能阻止无尽的重复。弗洛伊德认为：“抑制病人的强迫性重复，使其转变为回忆的动机，主要方法在于对移情的处理。”<sup>[15](154)</sup>移情在疾病和现实生活之间创造了一个中间地带，它为二者的转换搭建了一座桥梁。因此书写创伤在于如何通过行动化复现和修通与移情作用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历史学家需要具备一种能够与受害者或研究对象产生同情的能力，并找到一个不与任何研究对象认同的主体位置，通过移情作用营造一个自由联想的空间，在与过去历史的对话中，将滞留在对象内部的压抑物，尽可能地行动化复现出来。行动化复现或重复是修通历史创伤的前提，但如果这种复现或重复没有得到抵制，可能会呈现为盲目或是无法控制的重复，即始终要求回到被压抑的原始状态。修通历史创伤必须要认识到行动化复现是无法消除和克服的，过去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它作为一种强迫性重复的对抗性力量，有助于创伤主体建立起一个批判性的距离，使主体能够回忆起过去发生的事件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做出区分。修通不是要求回到创伤之前的历史状态或一种辩证的超越，而是在接受创伤事实的基础上，与其取得和解；它也不是一个线性的、直接了当的过程，而是要不断地迂回到问题所在，并与创伤事件进行反复协商、沟通来取得一致，“修通作为一种心理运作方式，它使主体接受某种被压抑的因素，将自己从重复机制中解放出来”<sup>[16](488)</sup>，成为一个能够清醒意识到创伤的行动化复现，并在更高层次的意识中主动地回忆和把握过去的主体。

书写创伤作为一种在后创伤(post-traumatic)语境中与过去的创伤经验进行对话并取得和解的过程，它通过对语言的述行使用使历史的过去与现在的对立转变为对话关系，其中各种力量通过相互交流和对抗而对现实的历史语境提出挑战；这一挑战是语言的述行使用也是对读者的一种挑衅，即书写的言语行为激发读者的思考，使读者有意识地与过去建立起批判性的距离，对这一挑衅作出现实的回应，并在自身所处的

当下社会历史语境中予以实际的解决,历史的理解因此成为关涉社会文化、伦理政治、历史语境的多元互动和行动实践。这种对行动化复现有意识的控制以及在创伤修通中对社会伦理政治实践的行动最初表现就是哀悼行为。

哀悼是一种主动的意识或记忆,是创伤经验经行动化复现后走向修通的现实行动。拉卡普拉使其脱离了弗洛伊德狭义的治疗框架,与更为广泛的伦理、政治实践联系起来,使书写创伤和历史创伤的修通呈现出“伦理转向”的趋势。即哀悼尽管能够抵制强迫性重复和死亡冲动,但它只有在社会伦理政治语境中才更为有效;故不能将其限定在个体或内在心理领域,而要作为一个社会性过程发挥作用。它应该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心理的社会化或仪式化的顺势疗法(homeopathic),克服忧郁症患者孤立封闭乃至绝望的精神状态,必须取得各种社会力量或广泛的社会团体的支持。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或群体,创伤主体与整个社会密切相连,无论对自己、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负有伦理和政治的责任。哀悼就是让创伤主体能够获得一种作为伦理和政治主体的能力。无论对创伤书写者还是阅读者,哀悼行为都是对创伤经验的一种批判性回应,一方面疏通了创伤情感中被阻滞的力量,一方面又将这一疏通经文本阅读引向社会伦理和实践维度,以获得社会性保障和支持。

综上所述,纳粹大屠杀的否定性崇高是对宗教神圣性的世俗化置换,是与想象的总体性分离后被压抑事物或意识复归的表现。纳粹主义者活在一种虚幻的总体性的美学意识形态中,作为一种现代技术社会和官僚体制中错位了的牺牲主义(sacrificialism),把集团内部的他者当作了替罪羊。就结构性创伤而言,要修复这种创伤,联邦德国人民应当深刻反省并破除虚幻的总体性和回到这一虚幻总体的宗教救赎思想,认识到这样的总体性其实并不存在,不过是纳粹主义者一种虚假的自我投射,并能正确处理自我内部的焦虑,拒绝将其投射到他者身上。同时历史创伤的修通需要借助书写创伤和对创伤经验的批判性阅读的行動化复现,让压抑的历史经验得到表达或宣泄,从而有意识地对失去的过往进行哀悼,并在现实社会语境中作出实际的变革行动,拉卡普拉认为“在集体层面任何真正可行的调解不仅取决于同情和哀悼,也取决于更大语境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唯此,哀悼行为本身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实际上是政治的意义。”<sup>[5](215)]</sup>通过批判性距离对创伤经验的有意识控制,促使人们改变导致创伤事件发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条件或各种可能性动因,是避免创伤重复的必要

方法,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前提。为恢复创伤主体对创伤经验的主动记忆,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人们还必须从集体中吸取力量,如杰弗里·C. 亚历山大所言:“寻找一些集体的方法,通过公共纪念活动,文化再现和公共政治斗争,消除压抑,让失去和哀伤所郁结的情感得到表达。”<sup>[17](7)]</sup>此类社会实践仪式的缺乏,可能阻滞受害者的哀悼活动,使其停留在反复行动化复现的忧郁或一时的宣泄之中。因此,书写历史和哀悼必须同时作为一种伦理政治的“书写创伤”行为,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伦理维度,才能保证修通历史创伤的有效性。

## 四、结语

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中,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等激进建构主义历史学家大有将历史书写视为语言决定论的倾向<sup>①</sup>,其将历史解构为语言的主观建构容易虚无化历史;而保守的实证主义史学更是将历史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物或对象,采用一种文献式编撰或语境化研究,压制了历史本身的多重维度及其与现实互动对话的可能性。因此,在历史书写的艺术性(文学性)问题上往往出现一种简单的对立或同一。拉卡普拉并非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折衷的调和,而是强调书写创伤中真理陈述或语言与其他诸维度的互动,如言语行为对伦理实践的现实影响,尤其是书写创伤的语言述行使用能够在与历史的对话和行动化复现中疏通各种力量,继而在伦理转向中诉诸更为广阔的社会实践,以挑战和变革现实语境,修通历史创伤。拉卡普拉借用精神分析学方法解决了历史学研究中的各种二元对立(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构、主观与客观、历史与文学),使文学书写及其语言使用在修通历史创伤中发挥了重要的能动作用,为消除历史创伤的重复提供了可供尝试的解决办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尽管当前全球各国在诸多问题上尚无法达成共识,拉卡普拉这一“伦理转向”的思考在全球化尤其在各种恐怖袭击和屠杀阴霾密布的现实境遇中,为推动世界主义理想的建构,指出了亟待践行的方向。

### 注释:

① 1968年学生运动要求改变联邦德国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认为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是联邦德国与生俱来的危险要素,因此必须消除资本主义。详情请见吕一民,范丁梁.“克服过去:联邦德国如何重塑历史政治意识[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10):20-21.

- ② 关于德国历史学家之争的来龙去脉详情请参见范丁梁. 事件与记忆之间的“历史学家之争”[J].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③ 战后至 90 年代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复杂纠结的态度变化详见吕一民, 范丁梁. “克服过去”: 联邦德国如何重塑历史政治意识[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4(10): 16-27. 反犹太主义在战后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清算。
- ④ 实际上双方的论争十分焦灼, 这里的二元对立是种聚焦后的极端化表现。比如诺尔特明确说明他并非要抹杀大屠杀的独特性, 也并非为希特勒辩护, 而是为了避免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参见诺尔特《历史传奇和修正主义之间?》《不愿过去的过去》等文章, 载哈贝马斯等. 希特勒, 永不消散的阴影?——德国历史学家之争[C]. 逢之、崔博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但这些在极度情绪化的论争中最终都走向了混乱。正如尼培代所说:“进行学术探讨的论争领域太过敏感, 道德政治的激情也太过激烈。本来就十分困难的区分和分野, 在这场混战中消失不见了。”(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 在怀疑的统治下[A]. 希特勒, 永不消散的阴影?——德国历史学家之争[C]. 哈贝马斯等著, 逢之、崔博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218.)
- ⑤ 对老鼠的恐惧源于弗洛伊德研究神经症中的一个故事: 是一种对犯人的惩罚方式, 即用盛有老鼠的盆罩住犯人臀部, 使老鼠钻进其肛门。参见 Sigmund Freud, Notes up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 [A],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10) [C]. Trans. James Strache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8: 153-249.
- ⑥ 这是一种内心焦虑的想象性投射。阿多诺也将反犹太主义的本质界定为“虚假投射”, 但主要是从康德意义上考察的, 认为主体根据感觉中投射的外部事物印象来创造外部世界, 同时又能够在外在印象的综合统一性和脱离外在印象的内在印象方式在回忆中建构自我之间做出区分。即主体能够反思自我本身及其投射进来的外部世界。阿多诺认为反思是一种有理性的生命, 它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投射而产生出来的; 事物的普遍秩序则是主体自觉投射的无意识产物; 反犹太主义者则丧失了对投射行为的反思能力, 不能反思客体也不能反思自身, 无法通过省察自身的方式来破译构成自己权力欲的秘方, 而是将其强加在他人身上。参见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多诺著. 启蒙辩证法: 哲学片段[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172-184.
- ⑦ 在弗洛伊德那里, 对力比多的色情或破坏性本能的压抑以使其转化升华为“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 升华会抵制压抑物的回归。拉卡普拉认为纳粹意识形态对犹太人的屠杀和牺牲, 也是通过对共同体内部他者的压制和否定, 实现对总体性的救赎而获得一种崇高的快感。
- ⑧ 海登·怀特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元史学是为反击实证主义的史学研究, 确有语言决定论的倾向, 但纵观其整个史学理论, 如在 *History Discourse and Literary Writing* 一文中(In Tropes for the Past: Hayden White and the History/Literature Debate, kuisma Korhonen ed., Amsterdam-New York, NY: Rodopi B.V., 2006.), 以及在 2014 年出版的《实践的未来》(The Practical Pas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中, 可见怀特对此前的观点有一定修正, 或者说一种补充。拉卡普拉通常将怀特视为激进的建构主义代表加以批判, 可能不过是寻找一个批判激进建构论的靶子, 目的是否认语言决定论, 可参见 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M].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chap.1.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chap.2.

## 参考文献:

- [1] Charles Maier. The unmasterable pas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 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 Saul Friedlander. Trauma, Transference and “Working through”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Shoah” [J]. History and Memory, 1992, 4(1): 67-70.
- [4] 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5] 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M].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6] Dominick LaCapra. 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 History, Theory, Trauma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7] Sigmund Freud. Moses and Monotheism: Three Essays [C]//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23). Trans. James Strache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64: 124-127.
- [8]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History [J]. Yale French Studies, 1991(8): 31-36.
- [9] Rudolph Binion. Traumatic Reliving i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Film [M]. London: Karnac, 2011.
- [10] 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茂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 [11] 马克斯·韦伯. 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M]. 康乐, 简惠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12] Sam Durrant. Undoing Sovereignty: Towards a theory of critical mourning [C]// The Future of Trauma Theory: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culture criticism. Gert Buelens, Sam Durrant and Robert Eaglestone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13]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哲学片段 [M]. 渠敬东, 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14] Dominick LaCapra. Soundings in Critical Theory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5] Sigmund Freud. 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Trough [C]//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12). Trans. James Strache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8.
- [16] Laplanche J, Pontalis J-B.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M]. New York: Norton, 1973.
- [17] 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C]//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Jeffrey C. Alexander ed.,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Repetition and working-through of historical trauma

ZHANG P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In Historikerstreits' Debate, neither side realized the transference function of history writing or recognized the deep motive of Nazi holocaust. By adopting Freud's psychoanalysis, LaCapra analyzes the secularization of religion in Europe, believing that the holocaust is a return of repressed historical trauma, and scapegoating and victimization serve as the most important mechanism in its function. Writing trauma is a kind of acting-out of historical trauma, helping to release and to make the return of the history repressed, and making the trauma subject obtain the ability of an ethic politics subject. LaCapra advocates an "ethical turn" in critical theory and emphasizes the social ethic dimension of mourning in working-through and history writing,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ethic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Only in the context of obtaining wide social force and enough support from social groups, can its effectiveness be assured.

**Key Words:** writing trauma; transference; traumatic repetition; working-through; ethical turn

[编辑: 胡兴华]

---

(上接第 174 页)

##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dict of Toleration by Calerius: A new view on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LI Jirong, XU Jial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Edict of Toleration, which gave the toleration to the Christians direct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Roman Empire, was issued in 311 together by four emperors: Calerius, Constantinus, Licinius and Maximinus. There are only such two texts existing as "Edict of Milan" and "Edict of Calerius." But the edict was not put into practice ow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edicts, the death of Calerius and the influenc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who was lavish in many scholars' praise. As a result, most scholars both abroad and at hom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Edict of Milan," failing to notice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alerius' Edict.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texts, the present essay will compare the different texts and analyze the position of this edict so that we will have an objective judgment of the edict.

**Key Words:** Calerius; the Edict of Toleration; texts; the Edict of Milan; the Edict of Toleration by Calerius

[编辑: 苏慧]